

伟大的书

Great Books

[美] 大卫·丹比 著
曹雅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Great Books

新
世
纪
版

汉
译
精
品

伟大的书

Great Books

[美] 大卫·丹比 著

曹雅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版

精品
汉译

导 言

1991 年秋,在与第一次进哥伦比亚大学时隔 30 年后,我回到了学校,和 18 岁的学生们坐在一起,和他们读同样的书。但不是随便什么书。我们一起读了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我在 1961 年作为哥伦比亚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时既天真又无所用心地修过两门必修课。在那个时代谁也不可能想到在后来的数十年里,这样的课程会轮番地被指责为不公正的压迫,同时又被尊崇为西方文化的堡垒。

其中一门课是文学人文——人们都简称它人文,它致力于提供(过去也是)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另外一门是当代文明,它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这两门都是“大书”课程,或者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通览。按年代顺序囊括了一长串重量级的名字,就像某种想像中的光荣神殿里的大理石胸像那样。这样的课程是在世纪初第一次在哥大创设的;然后它们传到了芝加哥大学,在 40 年代的时候又传到了

许多其他大学和学院。从那时起，说得轻点，它们退潮了。有时候它们接近于绝灭，但不是在哥大或芝大。

尽管我作了解释，我的同学在1991年还是会奇怪我的所作所为——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上跟学生们在一起。我肯定是最不伦不类的学生了：48岁，《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一个丈夫和父亲。一个安了身、立了业的男人却连自己也不清楚他哪里有点不安宁起来，更别说这些学生了。我仅仅是想要知识吗？这些书当中的许多我以前都读过。况且这些同学可能已经注意到对我来说生活中好像没有比读那些书、参加那些讨论更重要的事了。

这本书是我第二次做学生这一年的记叙。我是按它发生的原样写的，它既是一段时而危难时而宁静的旅程，又是我在中年以如此的饥渴吃进去的那些伟大的故事和震撼人心的思想的导言，一本历险记。它也是一本幼稚的书，一本业余爱好者的书——换句话说，一桩蠢事。此外再不能是别的了。

这个项目始于我妻子建议我要么忍耐下去要么闭嘴的时候。在1989年或1990年的什么时候，凯瑟琳·西恩和我正在以愈来愈强的惊诧读着关于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性质的辩论。现在仅仅引用辩论时的陈词滥调就能引出一股夸张无聊的蓝烟：西方经典以及一个“欧洲中心论”的课程表在这个人口由许多从欧洲以外的地方来的人所组成的国家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非洲奴隶的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后裔？难道那些以往没有多少权力的群体，如妇女以及少数民族，也应该被要求按照课程表去读一个由死了的白种欧洲男性所写的作品吗？

这些问题本身不是没有道理，但很难相信任何16岁以上的人现在会把“死了的欧洲白种男性”这个用语当做一个谴责用语来使用。这些词已经带上了一种奇怪的、过去时期的味道，就像我在

1968年春天戴过的那些彩色念珠一样,在那之后被压到了衣柜的抽屉里。这些基本上是由学术左派,特别是由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黑人学者发出来的抱怨,已由保守主义者通过以西方传统对美国国家精神的重要性的阐述,一一作了响亮而宏伟的回答。接连两届的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威廉·班奈特和林恩·V·契尼都谈到了人文学科教育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们的一些更有争议性的言论则暗示,如果我们停止阅读该读的书的话,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或相对主义——或者任何威胁共和政体的东西——挡在门外。这里有一些国家的、甚至地理上的重大考虑。文学已经变成了一件政策事宜。我为文学的这一命运而感到沮丧,从保守主义者对学术左派的攻击中涌现出来的种种论点也使我沮丧。比如,在罗杰·金伯尔出版于1990年的《职位稳固的激进分子》一书中,文学被当成说不清有多高贵但本质上是一个静止的价值体系,它应该灌输给每一代美国学生。被动接受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反应;但我也不理解这些著作何以能达致其标准经典的地位,如果它们没有在读者身上产生比心怀感激的接受更有生命的东西的话。

在我跟踪这一辩论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愈来愈强烈的不真切感。30年前,我颇为喜欢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这两门课,但到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就像一个人会忘记大多数在大学里修过的课一样。这两门课的书到底在我心里留下了什么,是一堆印象的残渣呢,还是趣味和感受性、甚至行为的框架?我说不清楚。这就是神秘之处,不是吗?教育的神秘,它到底跟我们有大千系呢?辩论的参与者们似乎知道。他们为这些书以及这些书所代表的西方传统作了奢侈的辩护或攻击。同时,他们也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抽象的、没有特征的方式讨论了这些书本身——这些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著作,把它们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中的棍棒和长

矛。莎士比亚是殖民主义的代言人？卢梭是“霸权叙述”的一部分？希腊经典是民主的一个堡垒？人们用这样的词是不是真的在讨论文学和哲学？你得到这样一种不妙的感觉：至少有一些论辩者二十多年以来没费事去读过这些被讨论的书。这些经典著作是否真的乏味得像右派使它们听起来的那样，或邪恶得像左派使它们变得那样？这些书被剥去了它们的机体和味道。在许多这样的论战中，阅读行为本身变成了一具空壳，消除了它在任何读者生活中的位置，它所带来的压力和乐趣，它的乏味，以及它时而带来的极度欣快，使它失去了其孤独和销魂的特殊性格。

然而，尽管这场辩论在我看来很莫名其妙，但它却有一种刺激的效果。几个月里，我都很气愤，甚至痛苦。我感到被人骗去了什么东西一样，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了为什么。如果说有些论辩者显得离那些所讨论的书很远的话，我知道我离它们也很远。我读过，但我已经忘了，我感到一种失去，仿佛一个老朋友消失了一样。我心里充满了渴望和好奇。实际去读这些书会是怎样一种经历呢？一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愤懑、什么样的刺激和什么样的痛苦呢？最重要的，它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它们何以引起妇女、黑人、激进的学者如此大的愤慨，又何以使保守的男性政客如此自鸣得意呢？我们到底在这儿说什么呀？

我变得越来越有气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和一个读者的凯瑟琳和我观点一致，但却越来越不耐烦我的情绪。她坐在我们在纽约的公寓里，一本接一本地读，在床上读，坐在起居室窗边的椅子上读。她读书的时候腿上常常卧着一只猫，满意地喵喵叫着；它沉迷在阅读中的女主人几小时地挠着它的脑袋。我妻子太友善了，也许是也太忙了，而没有指出在后来时显得很明显的事：我自己已经不再是个读者了；或者这么说吧，我已经成了一个只读新闻、时事

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杂文的读者。“要是你对这事这么不高兴的”，凯西终于说道，“你干吗不再去上一遍你的哥大课程呢？”

这就是读者对非读者的报复：你为什么不停止抱怨而去阅读呢？回答我的问题的途径无疑就在手边。哥伦比亚大学离位于曼哈顿西城的我家只有一两英里。这些课程尽管在选材上略有不同，但其用意和目的并没有多少改变。

不管是在 1961 年还是在 90 年代，哥大很少有人把文学人文课或当代文明课称为“大书”课程，这个词带着点金叶边皮装书的味道。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要求每一个人必修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不管这些 18 岁的学生以后干什么事，操什么行当，不管他们以后创什么伟业或造什么罪孽，他或她都不应该没有这一传统的筑防。这些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这些书是一些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其次，这两门课程不是由在演讲厅里滔滔不绝的权威或专家教的，而是由在不同的狭小领域工作的各种各样的教员教的，其中可能有教这些课程教了几十年的资深教授，也可能有还在写博士论文的四年级研究生。上这两门课的老师来自许多领域。英语及比较文学系支配了文学人文课，但也有来自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斯拉夫研究以及中亚语言和文学系的教授。当代文明课是由历史学家们教的，但也有政治学家、哲学家、古典文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时而还有社会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所有的人都得参加到学术左派所嘲笑的西方文化的“叙述”当中。

这两门课程的迷人之处(有人说是它们的长处)在于其引以为骄傲的非专业化,及其古老的、武装学生的自我和公民心的理想。这两门课尽可能地远离时下流行的“理论”以及诸如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些学术的敏感点。学生不管那么多地跳了进去;他阅读一系列大书。用当今的学术用语来说,这两门课是一个丑闻。

我自己也急于跳进去,但许多事情干预了我,等我在一两年后再回到这一念头上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正在一种个人危机感中跌撞,这种混乱使得这一设想或许比我以前想的更为必要。

我一生一直是个新闻从业者,自1969年以来,我就一直是一个电影评论家,我很喜欢杂志写作这一行当。但到了90年代初,我开始心生厌恶,不是厌恶电影或电影评论,而是厌恶生活在法国哲学家G·德鲍(Guy Debord)所谓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那个巨大的表象和模拟系统,那种构成20世纪末媒体社会几乎每个成年人的心理环境和习惯的信息、图像和种种态度的密不透风的氛围。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也厌倦了媒体;在那个图像的深谷里,在那个狂乱而阴郁的另一半生活里——那里充满了名字、地方、闲聊、打斗、赛车、枪击、专家谈话、夫妻互相指责对方不忠的日间节目、十足的忙乱感、不停的运动、难以置信的活动和从头到尾的无聊、需要得到满足时的哼哼声——我感到的不仅仅是不安。

而我的需要没得到满足。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而不稳定的东西。一经就位,立刻就分解了,某些片断得到充实,其余的则被匆匆推离舞台。一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信息,这就是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焦虑不安得像半疯了一样的诸多原因之一。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厌烦了但却仍然饥渴不解;我被抛进了现代的媒体生活中,一种满怀厌恶的兴奋状态中。到这个世纪末,到这个千年期的尽头,媒体威胁要全面接管,把文学推

出视野之外，我的厌恶中带上了各种我也说不清楚的情绪——怀旧、遗憾、愤怒，甚至绝望。

但现在不是唱哀歌的时候。

我需要开始写这本书，部分地是因为我已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感到我所读过的或我所理解的正在滑走。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大楼的基础正在变成沙子，而我却坐在楼上的阳台上眺望着大海。感到它摇晃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我感觉到我的身分已经软化并没入了表象的气氛中，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结束而我又从哪里开始。我的记忆正消失于媒体生活的迷雾中，我是个看生活而不是个过生活的人。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专业电影评论家在经历一种特殊的焦虑，然而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都是电影评论家；我不过碰巧写下并出版我的观点。人人都生活在媒体中。

阅读“伟大的书”似乎是“中年危机”或身分危机或不管什么的一种奇怪的解决办法。干吗不去旅行或是去狩猎大象呢？干吗不去追少女呢？干吗不去出家当和尚呢？我相信这些是传统的——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解决办法。但如果我想历险的话，我想以一种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方式历险。我想，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

可是干吗不就这么坐下来阅读呢？干吗要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因为我想看看别人怎么阅读——或不阅读。学生们是在媒体里长大的。他们是什么样子？在这样一个文化争论的时代，在远离这场文化之战但却显然被其打闹声所触及的大学的一角，教书发生了什么变化？要驱散这场“文化之战”的种种粗鲁言行和离题枝杈，办法之一就是去看看教室里发生的事。

我想加入这场辩论，但我要做的是从根基着手，始于作品，终于作品，寸步不离这些书本身。

在整整一个学年里，我读了这些书，观察了学生和老师，反省了我自己。同时，除了几次短期的休假外，我仍然像我多年来那样去看电影并为《纽约》杂志作评论；我帮助妻子早晨叫孩子们起床，晚上安置他们睡觉，总之，我尽可能地过我作为父亲和丈夫、纳税人和聚会参加者、朋友和敌人的正常生活。我想，关键不是要放弃我的生活，而是要充分地过活它，要看看这些书如何纳入我生活的方式。

我订下了一些基本规则。我会读每本书并作笔记，但我只写及那些最吸引我的书。把虔诚延伸到那些没有一个人对之反应的经典著作上去是学术上的一种邪恶，我得避免它。我会为乐趣和教诲而读，如果我烦哪一本书，我会说出来。其次，我会依赖于我自己的反应以及课堂上的材料，避免第二手来源。我知道不重读一些经典的批评著作是不可能的，如艾利希·奥尔巴赫^①的《模仿》这一几乎可以作为文学人文课指南的、已有半世纪之久的评论名著。但我不想泡在当代的学术批评中，不然的话，我所有的时间就得花在理解最新近的理论家并和他们发生争论上，而没有时间专心于马基雅维里。我决定只读一定量的新近学术批评，以便对当今的教授们都在干些什么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和评论家，我学会了相信直接反应——不是认为它们不容置疑或不容更改，而是相信最初的感情力量。出于必要同时也出于脾性，一个文化方面的新闻从业者通常是一个印象主义者和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很少在意我们怎么知道事情，他在意的是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效果是什么。构造、颜色以及经历

① 德国语文学家和评论家(1892—1957)，代表作有《模仿》、《文本的诠释》、《文学语言及其爱好者》。他的思想体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文学传统和高度的神学精神。

刺激他；如果他还没有麻木的话，艺术陶醉他的感官。但艺术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成分使他扫兴，或对他来说了解它们仅仅是次要的事宜。我相信我不会被指责为无知。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而不以自己所缺乏的为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避免批评的技术；我想犯纯文学这种不可言说的罪过（在学术圈里），也即为读者的乐趣以及我的乐趣而写这本书的罪过。

我希望没有人会把这本书当做是对某一大学的颂扬以及对其他大学或学院的贬低。它的意图不是这样。没有一条通往天堂的皇家大道，而只有许多大路和小路、数不清的荆棘小径以及弯弯曲曲的迂回之路、成千上万的台阶和转弯通往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是这本书的背景，但不是它的主题。任何在其中寻找学校历史或管理细节的人必须到别处去找。一般读者只需要知道，当代文明课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大开设的战争议题课，从一开始它就被认为是对西方文明的捍卫者；文学人文课（最初称为人文A）则是于1937年从一门由教师兼编辑约翰·厄斯金多年发展而成的综合荣誉课程演化而来的。文学人文课从一开始时的用意就是在一个东欧或南欧移民（未清洗过但不是不可清洗的犹太人和需要同化进这个国家更大的文化中的意大利人）的孩子日渐增多的学院尊奉基督教欧洲文学。而这样的课程现在被攻击为排斥边缘化移民后代或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或妇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这些课程中是否还有任何原本的用意或效果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开始时好奇的事情之一。

还有另外几点需要说明。我没有说这些是惟一重要的书，或它们是西方经典的最佳集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书目是武断的。我相信在哥大大多数不管是教授还是管理这两门课的人都会承认

这一点。其他大学有不同的但同样正当的书目，哥大自己在不同时期也有过不同的书目（自 1937 年以来，有超过 130 本书以不同的搭配出现在文学人文课的书目上）。要是有足够的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样样都读，这样的书目就没有任何必要了。但任何提供一门课程的人必须作出选择，书目无疑具有代表性，因而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析的主题。其次，哥大也颇为清楚地表示了这两门课程的预备性质：核心课程所代表的西方传统不是用来排除其他传统的，而仅仅是为本科学生提供一个站立其上的基础。学生一般来说在头两年里修这两门课。然后他开始选修历史、或生物学、或考古学、或美国黑人研究等专业课程。如果他有文学兴趣的话，他还可以读玄学派^①诗人和 19 世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或者读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W·E·B·杜波依斯、理查德·怀特、托尼·莫里森这样一些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或者读像 Ngugi Wa Thiong'o（肯尼亚作家）和青瓦·阿切贝（尼日利亚作家）这样的非洲作家的作品；或者像 Naguib Mahfouz 和穆罕默德·达尔维希这样的伊斯兰世界的作家的作品。他可以做任何对于自己的专业、阅读、身分以及生活有益的事。但首先，他从一个特别的地方出发，我们值得问一下这是否是个好地方，是否是个正当的地方，是否是个必要的地方。

① 玄学派是英国 17 世纪的一个著名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有多恩、马韦尔。此诗派善于将不和谐的东西聚在一起，语不惊人死不休。20 世纪初它被人们重新注意，以一扫维多利亚甜蜜腻人的诗风。

目 录

导言.....	1
---------	---

第 一 学 期

第一章 荷马 I	3
插曲一	33
第二章 萨福	37
第三章 柏拉图 I	48
第四章 荷马 II	65
插曲二	81
第五章 柏拉图 II	86
第六章 索福克勒斯.....	105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	121
插曲三	136
第八章 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	139
插曲四	159
第九章 维吉尔.....	160
第十章 《旧约圣经》.....	175

第十一章 《新约圣经》	196
第十二章 奥古斯丁	214
第十三章 马基雅维里	226
插曲五	237
第十四章 霍布斯和洛克	241
第十五章 考试	261
寒假	266

第 二 学 期

第十六章 但丁	271
第十七章 薄伽丘	287
第十八章 休谟和康德	300
插曲六	323
第十九章 蒙田	325
第二十章 卢梭	337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亚	356
第二十二章 黑格尔	380
第二十三章 奥斯丁	400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和穆勒	418
第二十五章 尼采	442
插曲七	467
第二十六章 波伏瓦	472
第二十七章 康拉德	508
第二十八章 伍尔夫	536
后 记	571
译者后记	578

第 一 学 期

第一章 荷 马 I

《伊利亚特》

爱德华·泰勒教授对我们说：我们将建立起一个自我
大学书店；我失去的注意力

以往和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当代文明课开始：安德斯·史蒂芬生，以及西方日历的强
权地位

泰勒教授教《伊利亚特》

英雄阿喀琉斯

我已经忘了。我已经忘了它极端的残忍和极端的温柔，如今
读它，不管翻开它 15693 行的何处，我都受到震惊。“震惊”，一个